

东方与西方历史观的对话

——与美国学者萨米尔·皮尔逊就历史观念的探讨

赵轶峰 整理

(东北师范大学 明清史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 皮尔逊教授从文化传统差异的角度论述了中国史学研究中“客体”的过度偏重,以及西方学者更注重主观参与与历史客观的结合的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念及其利弊得失。中方学者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皮尔逊教授观点的同时,还指出了道德评价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认为历史研究既要主观地从多种角度去考察,又不能淡化原始文献的客观性。

[关键词] 历史观念;道德评判;相对主义

[中图分类号] K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01(2000)05-0028-07

美国南伊利诺州大学教授、富布赖特学者萨米尔·皮尔逊(Samuel C. Pearson)在《文明比较研究》创刊号(2000年第1期)上发表了题为“Contrasting Approaches to History in East and West”(东方与西方全然不同的历史观)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根据几年来先后在中国几所大学讲授美国历史的体验和观察,对所看到的反映在中国与西方史学研究中不同的历史观念进行了评论。在他看来,这种不同构成了一种分明的反差对比。对此,中国学者也给予了积极的回应与争鸣。兹将其要点整理出来,以飨读者,期于对当前的史学研究有所裨益。

一、皮尔逊: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观点

皮尔逊教授指出,对于一个美国学者说来,在中国讲授历史的最大的挑战是要面对全然不同的历史观念假设和思维方式。这种不同既植根于文化传统的差异,也是由于某些教学资料在中国的缺乏和一些哲学假设的影响而造成的。他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了这种差异。

首先,他发现中国的美国史教学过多地依赖教课书,而十分欠缺对学术专著和原始资料的介绍和运用。他指出,使用学术专著和原始资料在我们美国的教学表现出以下的好处。它们使学生得以亲身获得“搞”历史的经历,比如,在不断接触的含有歧义或者相互矛盾的证据的启示下在多种理解中转变和权衡。这些资料也会使学生更好地体会到,历史是历史家的产品而不简单地等于过去留下来的资料总和。另外,对于讲授复杂的因果关系而又担心绝大多数

[收稿日期] 2000-04-28

[作者简介] 赵轶峰(1953-),男,内蒙古开鲁人,东北师范大学明清史研究所所长,教授,加拿大埃尔伯塔大学历史学博士。

教材会把问题简单化的美国历史学家说来,专著和原始文献使学生有机会去理解这些历史学家的主要著作。中国这种资料的缺乏限制了博士论文的质量和视野。更重要的是,造成了中国培养下一代历史学家的史学方法素质的局限。

在皮尔逊教授看来,似乎中国的学生对历史的理解仍旧属于一种典型的 19 世纪欧洲的——把历史学的本质看作是科学,历史专业工作是客观性的,历史研究的结果独立于历史家之外的观念。他说:“直到 20 世纪,西方的绝大多数历史学家也赞同这种观点。但是晚近的西方历史学家中很少有把历史当作科学来看待或者谈论的了……20 世纪西方的历史编纂学受到克罗奇和柯林伍德的历史哲学的影响。他们认为历史学家和他们所研究的材料之间有一种必要的结合,所有历史著作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过去对历史家的当前兴趣的一种反应。这种观点通过把历史家本人包括到他的著作中而清楚地限制了客观主义的立场……对大量线性的、发展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假设持批评态度的后现代主义史学家坚持认为,只有当历史家注意到他或者她在历史著述事业中扮演了参加者的角色的时候,对于过去的、严肃的研究才会开始。美国和西方的历史,已经终于从自然科学的仆从状态逃脱了出来。从西方的观点来看,同样的逃脱也是当代中国历史学科百花绽放的根本条件。进一步说,西方史学家面对的似乎永远也无法穷尽的洪水般的资料本身也鼓励了一种特殊的历史相对主义。传统上说,历史家曾经相信:知道得愈多,理解得愈好。但是现在我们可能已经面临了一个从对信息的把握中得到的报偿开始降低的临界点。经常的情况是,我们知道得愈多,我们就似乎愈发现我们的概括趋向于承认多重理解的可取……”

他谈到,在中国学生的客观主义观念模式基础上的是一种以道德化的语汇来阅读历史的倾向。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特殊的事件和个人,用“褒贬”史学的陈旧伦理观念和辩证法结合在一起对重要历史人物加贴“善”和“恶”的标签。

在皮尔逊教授看来,中国的学生在很大程度上乐于在历史学习中寻求归一的因果解释,而难以承认同一事件可以有多种合理的因果分析。这和他们历史的定义和可能的解释相关。

皮尔逊教授还认为,“中国与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史学方法的另一个显著的对比在于对思想史的不同理解。中国和西方都注重思想史研究。在美国,甚至思想史的主题也已经从单纯的精英们关于普通人的思想拓展到普通人关于他们自己的思想。这个取向正在拓宽和改造思想史的体系。我们中的绝大多数同行相信,思想史与哲学史或者文学史的根本区别在于历史学家是在更大的范围中,更少在精英圈子中,来考察思想,并且对于思想的社会环境给予深刻的关照。在过去的半个世纪,这样的认识已经使得美国研究思想史的历史学家愈来愈注重妇女和非知识分子,注重那些不是政治领袖但其思想可能对其社会状况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们,注重那些特定地点和时期的以其思想方式反映了时代特征的普通人的思想。”思想史专注于人们头脑中的经验,它可以包括单纯的或复杂的人们的简单的态度,以及系统的知识和推想。以外文出版社于 1991 年出版的一本《中国思想史》为例,这部要考察“中国历史上各个时代的主要思潮的特征”,并表出“最著名的思想家的主要贡献”的著作中讲到老子、墨子、孔子、孟子、鲁迅,却绝没有提到“阿 Q”这种人的思想。即使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思想史的内容仍然是精英的思想。在任何民众并不仅仅是精英手中的工具的现代社会里,研究精英的同时也研究大众的思想是唯一合理的关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他说到,他对现在中国研究大众文化的兴趣的兴起感到欣慰。

尽管看到以上所说的重大差异,皮尔逊教授指出,“我在中国教学的经历是建设性的。我

在每天面临的跨越重大文化障碍来交流,在分享学生对于历史和现实的卓越见解,在建立新的关系的过程中,受益良多。并且,我相信我的学生在我的鼓励下学习和成长了。将来的前景是,我们大家都会成为更好的历史学家。”

二、周巩固等:历史研究中的道德评价及其他

作为一名中国的大学教师周巩固先生认为,皮尔逊教授所提出的问题是存在的,其基本看法是中肯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大学教学中使用原始文献资料的不足,主要存在于外国史的教学。在中国历史的教学,资料是充分的,主要是如何更好地运用的问题。皮尔逊教授所说的在大学高年级的历史教学中充分使用学术专著和原始文献,从而使使学生有“搞历史”的体验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至于学生们习惯用单一的一种观念和方法来观察和思考问题,而不习惯有弹性的、容纳歧义的思维方法来分析问题,这也是实际的情况,一定意义上妨碍了学生从多角度、全面地、客观地认识历史。但是这并不是所有课堂的情况。在我主持的《西方史学史》的教学中,就很注重对西方的,尤其是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和流派的介绍,并注重启发和鼓励从多重视角来考察和分析问题。如果参照中国学术界的研究情况来看,我们对西方史学思潮有相当的了解。所以皮尔逊教授所说的那种明显的东方和西方历史观的鸿沟并不存在,沟通是完全可以达成的。我们也注意到,大学低年级的学生比较习惯线性的、非此即彼的、善恶二元论的思维。我们在教学中一直致力加以引导,使其具有一定的弹性。

周巩固说,皮尔逊教授批评中国史学家的道德评价传统,认为那等于把历史简单化,这更是值得商榷的。道德评判是古代中国和西方历史学家的共同的优良传统。当我们注意到全面地考察历史,运用具有弹性的思维方法的时候,道德评判可以是十分有价值的。古今中外的任何历史学家都不能也不应该摆脱道德评价,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理性和良知的关系问题。比如,在面对日本的南京大屠杀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的时候,尤其是,当面对日本的某些人企图否认这一事实的可耻做法的时候,我和我的学生们都难以抑制自己的愤怒。这不是理性和弹性思维可以解决的问题。皮尔逊教授提到中国与西方文化的差异对中西方历史学界的沟通造成了一些障碍,我深有同感,但我认为中国对西方思想的了解远胜于西方对中国思想的了解。现在的中国有许多人到西方留学和从事研究,西方的新的代表性的著述很快就会被介绍到中国。而根据我和一些西方学者的接触,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十分有限。其原因并不在于他们没有学问,而是在于他们不象皮尔逊教授这样对中国那么友好,那么感兴趣。由于时间的关系,周巩固没有就他已经准备的关于其它问题的看法做展开说明。

在周巩固教授发言之后,其他与会者开始提出问题。

问:皮尔逊教授,您能不能谈一谈您对英国殖民主义的看法。

答:我想,这个问题是和我与周教授在褒贬史学问题上的分歧相关联的一个问题。现在在西方,任何一个有声誉的历史学家都不会认为殖民主义是一个可肯定的事情。但是在一个世纪以前,人们的看法就不同了。殖民主义曾经为人们所接受,但现在已经不再为人们接受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可以提出的问题是,是什么原因使某些人曾经认为他们有权统治别人,为什么这种观念会消失,为什么英国似乎轻易地放弃了美国,却抓住印度不放?作为制度和思想的殖民主义是怎么改变的等等。又如,1863年以前的美国有奴隶制度,当时的美国人喜欢把自己的国家说成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而今天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奴隶制度和自由是矛盾的。

历史学家的工作是回答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

问:我觉得西方和中国的古代史学研究都运用道德评价的方法,请问皮尔逊教授对此有何评论,并请进一步谈谈道德评价与历史学的关系问题。

答:如果你的问题是关于古代历史家的观念,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没有异议。如果你说的是关于今天的历史学家研究古代历史的观念,我就不同意你的看法。现代西方史学家批评道德化的历史学的要点在于它使历史的复杂性和可能的歧解被忽视了。比如在考察一个民族,如日本,对他的邻国的侵略的时候,简易的办法是责备日本的一小撮军国主义者攫取了国家权力并发动了战争。但是在这些后边的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人民为什么会接受这种事情发生?一个社会和文化中的哪些东西使这种情况成为可能?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有善、恶,问题是究竟这个社会里的哪些“设置”使善或者使恶成为现实的。我不是认为没有人应该对历史负责,而是说,要对一个历史事件负责的人可能比我们平常想象的要多。

我不否认历史学有一个道德取向。但是对我说来,似乎道德化的历史学含着一种意识,就是把寻找什么人对于一个坏事负责当作历史学的主要问题。我认为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没有一个社会被一个人或者几个人控制的程度达到了他们可以无视社会上的其它人而随意行事的程度。以纳粹德国的兴起为例,我们当然同意希特勒是坏人,但是如果我们把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所作所为归罪于希特勒而止,我们就忽略了真正的问题所在:为什么纳粹会在德国取得权力?社会、经济、世界观和人民的观念中的哪些东西为这一现象发生提供了条件?我们的问题不是告诉孩子们希特勒是个坏人,而是理解如何防止希特勒那样的人掌握权力。

问:皮尔逊教授,您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一种 19 世纪的客观主义的和科学主义的历史观,那么在您看来,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吗?另外,有人说历史是成功者的记录,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您是这样认为的吗?

答:我和我的绝大多数西方的同事会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十分有力的分析的工具。马克思在工业化上升时期看到了这个过程带来的问题,尤其是对工人的影响。我们所不同意于马克思主义的是它的经济决定论。我们倾向于说经济是历史上很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有的时候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其它的因素,比如民族主义,可能在历史上成为比经济更重要的力。民族主义影响下的行为可能并不出于经济利益方面的原因。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不否认历史观察有一个道德的取向,但那不是全部。

问:请皮尔逊教授谈一谈年鉴学派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的贡献。

答:我想就前边有人提到的西方史学存在问题的说法先说几句。当然,不是凡西方的事物都是好的。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正在着力克服过分的物质价值观念在现代西方社会生活中造成的危害。中国的事情也不是靠模仿西方就能够解决的。关于年鉴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年鉴学派在二战以来成为欧洲的主导的历史学流派,并且对整个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历史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主要的影响之一,就是改变了过去把历史作为政治、帝王、精英的装饰品的传统,鼓励我们更多地注意对人类有比过去想象的要大得多的影响的因素,如自然力、社会整体和普通人。

年鉴学派在许多方面和马克思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有自己的客观规律的。这种看法可能就不会被年鉴学派所接受。年鉴学派承认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但其具体的

解释却又不同。年鉴学派也常常被称为新社会史学派,这个学派比马克思主义更注重普通人,其看到的是更复杂的而不是更简单的历史。

关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有没有什么贡献。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和许多西方历史学家都认为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是自18世纪50年代以来的100多年间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他们两个人都对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的启蒙主义的世界观念做出了挑战。弗洛伊德挑战了关于生命的理念,马克思挑战了西方政治经济秩序的合理性及其理念。他们的思想对后来人类思想的演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针对皮尔逊教授的观点,历史系教师、博士研究生张民军指出:皮尔逊教授提到历史唯物主义是一个以19世纪的科学主义观念为前提的理论,我们应该对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范畴做一下归纳,看一看是否有那种问题,而不是急于做出结论。皮尔逊教授对传统史学注重人物、政治、精英而忽视普通民众的思想、态度和社会生活做出了批评。这种从社会底层来看历史的倾向在50年代以来就已经在发展中了。另外,中国历史学家很早就有对于史料的批判意识。比如顾颉刚代表的“古史辨”学派,甚至更早的“疑古”思潮就包含了西方相对主义史学观念中注意史学家在史学著作中的参与的思想。博士研究生盛险峰说,皮尔逊教授的一些看法是从他关于历史的基本概念出发提出来的。历史是主体和客体的对话过程,作为事实的历史和作为历史家记载的历史并不是一回事。西方史学走过了从注重客体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到注重主体和历史知识的性质的思辨的历史哲学的转变过程。这种转变提示我们考察历史可以有多种角度。不过中国的历史学观念有许多问题,美国的历史学观念也有许多问题,大家应该平等地对话。

另外,有人请皮尔逊教授对周巩固教授提出的关于中国人对于美国的了解多于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的说法加以评论。皮尔逊教授回答说,的确,中国人想到美国人的时候要比美国人想到中国人的时候多。其中的一个因素,可能是由于中国人看到美国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从一个农业社会发展为一个工业巨人的变化。中国人也想实现这样的变化,所以很想了解美国。但是我不能肯定两国的学术界相互了解的情形也是这样。此外,我不认为过去形成的对于对方的了解是很正确的。事实上,我们都是某些成见的受害者。一位美国心理学家写了一本题为《美丽的帝国主义》的一本书。他说到,中国人对美国怀着一种矛盾的看法,一方面把美国看作一个美丽的有很多机会的土地,另一方面也把美国看作一个可恶的企图统治世界的霸权势力。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也很类似地包含许多矛盾。其实,绝大多数美国人从来没有到过中国甚至东亚,他们不了解近100年来中国发生了哪些变化。这里有许多信息交流中的问题和误解。

三、赵轶峰:在对话中探索

赵轶峰在讨论结束时谈到了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皮尔逊教授在他的文章中讲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历史教学中对学术专著和原始资料的注重问题。我们要看到他不是一般地从教学方法角度提到这个问题,而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这个问题的。他强调对于学术专著和原始资料的运用是引导学生避免简化地观察历史和过分追求对于历史的单一答案,养成思维的兼容度的一种训练。

第二,皮尔逊教授看到了西方的相对主义史学观与中国的客观主义或者科学主义史学观

的差别。这里我们要看到,他是参照着西方历史学长期的一个具体的演变脉络来谈论这个问题的。也就是说,他所参照的客观主义主要是德国的兰克学派所代表的,受19世纪的普遍的科学主义的观念所影响的史学传统。这个传统认为历史事实是客观地存在于历史家的思想和参与之外的。当历史家彻底掌握“客观事实”之后,历史的本来面目就会完全被揭示出来,产生某种终极的历史著作。由于历史学本质上是客观的,它的研究方法本质上是和自然科学一样的。参照相对主义史学观念,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种史学传统没有充分注意到今天的历史家主要是依据文献资料来重建和理解过去发生的事情。而这些文献资料又都是过去的人们的记录或者其再整理产品。过去的人们已经对历史进行了取舍,并且依据他们的概念和理论、价值观念进行了改造。因而,即使我们搜集了所有的史料,我们还是在前人的主观参与影响下工作。

相对主义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并不是要否认历史的一般客观性,而是突出强调了历史研究中主观因素的不可避免性,从而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历史判断的绝对化倾向。当然极端的历史相对主义是说不通的,任何人说清朝出现在明朝以前都是不能被接受的,因为历史具有客观性。皮尔逊教授本人并不主张极端的相对主义。此外,我们要看到,相对主义只是当代西方史学思潮中的一脉,而不是全部。所以克罗齐和柯林伍德受到一些人的批评。连受到这两个人影响的爱德华·卡尔也批评说在相对主义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就会把历史说成是从历史家的头脑中流出来的东西。

第三,大家就“褒贬史学”讨论得很多了,但对它和客观主义的关系涉及不多。进行道德评价的基础是假定评价者掌握了历史的真实。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就是“信史”、“直书”等等都含有主观的意识在内。比如正史中的列女传中记录的事情,可能是“真实”的,但是我们今天却不会再用同样的方式来写这种“真实”了,因为它们的含义已经不同了,重要的程度也不同了。我们今天可能要搜求另外的一些被当时的诚实的历史学家所忽略了的“真实”了。所以“褒”、“贬”之中必定包含许多主观的、时代性的因素。一般地说,道德评价的意识愈强,主观因素的渗入就愈多。另外,道德化的史学比较注重历史上突出人物的功过,如果过分,就易于忽略历史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内容,忽略普通的人们。那么道德评价是应该被摆脱的吗?不是。既然历史研究的主观参与是不可避免的,无论历史家的主观意志如何,道德评价,或者更广义地说价值评价,实际上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做的是看到道德评价的前提和局限,防止把具有强烈道德评价意识的历史看作完全客观的历史。其实,把历史看作科学和提倡道德史学是相互有些矛盾的。

第四,皮尔逊教授批评说,我们的学生们习惯于基于某种单一的或者终极的因果律观念来解释历史现象。讨论中被提到的关于历史的“元”的问题和这一点是相互关联的。元的问题,属于哲学宇宙观的本体论范畴。如果我们从哲学的意义上追问宇宙或者世界的本原,那么我们的回答应该是唯物的一元论的。而历史既然是宇宙间的一类具体现象,历史学是考察这类现象的人类活动,其哲学意义上的本元不言而喻,那就是宇宙的本元。在历史学层次上提出一个本元问题,如果“本”到极处,那就是宇宙的本元,用不着作为历史学问题来考察了。如果不“本”到极处,那么也就不是什么“元”。历史是过去的形形色色的人们在其具体存在的基础上出于复杂的动机、态度所做出的行为及所有相关因素相互作用所导致的结果的和。把这种复杂的组合归结为物质只是把它简单化为常识而已,只是重复了一个来自哲学宇宙观的命题。元的问题应该交给哲学家来探讨,而历史学家应该在自己的特定层面上来探讨问题。

皮尔逊教授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的思想史研究中的精英主义。当代中国的思想史的确是集中于以文字传播的思想家的思想的。思想家的思想虽然十分重要,但当下层人民大众的思想被忽略之后,就造成一种误解,以为精英们的思想代表了大众的思想,或者以为下层民众的思想没有价值甚至认为他们根本没有思想。这里出现了一个很有趣味的现象:马克思主义是强调人民大众在历史上的地位的,自认为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学家们却比当代西方的史学家们更忽略人民大众的思想和观念。是不是如此?为什么如此?很可以思考一下。当然,中国近年的社会史研究已经显示出愈来愈注重下层民众心态的倾向,这一点皮尔逊教授可能不很了解。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是,精英主义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持久的特征,直到今天,这个特征还十分强烈地体现在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这也也是值得思索的。

**A Dialogue between East and West : Discussion with American Fulbright
Professor Samuel Pearson on Historiography**

ZHAO Yr-feng

(Institute for Ming and Qing Studie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approaches and methodology of historical studies, this paper reflects a dialogue of Chinese historians with an American professor of history. It covers data collec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ians and their documents, objects and interpretations, and the role of moralistic thinking, etc. Pearson points out that relativism has significantly changed the approaches of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West, while Chinese historians are still treating history as a completely objective discipline. Western historians have been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people on the bottom of societies, while Chinese historians are largely preoccupied by the study of elite. Chinese historians do not refuse multiple interpretations of history but insist that moral judgment is not avoidable. The application of multiple approaches in historical studies should not lead to rejection of the objectivity of history. Extreme relativism is a misleading approach in historical studies.

Key words :historiography; relativism; multiple interpretations; moral judgment

[责任编辑:赵 红]